

“问题导向”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史

张 季

摘要: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100年来,中国共产党逆境飞扬,在解决问题中不断赢得胜利,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以问题为导向。梳理党的百年历史,可以将其划分为八个阶段,分别是:举旗定向、领导核心、独立自主、执政合法性、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自身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而每个阶段都堪称“问题导向”的典范。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百年史;问题导向;逆境飞扬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1.04.001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备豫不虞,为国常道”(《贞观政要·直谏》)。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提到,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讲“准备吃亏”时,曾一口气列举了17条困难,提醒全党引起高度重视。习近平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①学习党史,是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了搞懂弄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基本问题。100年来,中国共产党逆境飞扬,遍踏荆棘之路,不断赢得胜利,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以问题为导向,不断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前行,努力做到未雨绸缪,不打无准备之仗。梳理党的百年历史,可以将其划分为八个阶段,分别是:举旗定向、领导核心、独立自主、执政合法性、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自身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其中的每个阶段都堪称“问题导向”的典范。

第一阶段,建党及投入大革命洪流,着重解决了举旗定向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自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列强入侵、战火频仍、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悲惨境地。……从那时起,实现民族复兴就成为了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为了改变被奴役、被欺凌的命运,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努力探寻救亡图存的出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没有能够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犹如黑暗中的一道霞光,给正在苦苦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先进分子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我们党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始终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华民族开始艰难地但不可逆转地走向伟大复兴”^②。

100年前,为了救亡图存,中国的仁人志士曾先后建立过200多个政治党派,而最初只有50多人的中国共产党只是其中一个。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中国严峻的社会现实拷问着各路革命者,各路政治党派都在积极探索中国变革之路,但只有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在混乱嘈杂的

作者简介: 张季,博士、研究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十三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80-1984年就读于山东大学哲学系(北京100017; zhangjiyjs@163.com)。

①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4页。

②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历史舞台上脱颖而出,迅速崛起为代表中华民族先进性的革命组织。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既不食古不化,也不食洋不化,而是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井冈山的实践,红军将单纯的军事斗争变为武装斗争、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使得我们党的军队由财政上依靠共产国际转变为财政自主,这是一个政党把握自己命运的开始和象征。实践证明,只有具备独立的经济来源,才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基础,才能独立地选择自己的领袖,独立地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

这个阶段也是我们党付出巨大牺牲的阶段。八一南昌起义时的 22500 人,两个月后仅余 800 人;而参加秋收起义的 5000 人,20 天后就只剩 1000 人。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从极端艰难中走出来的,是从逆境中崛起的,其伟大实践历程是“问题导向”的最生动案例。

这时,党和红军的领袖不但要与敌人进行武装斗争,还要与自己队伍内的“左”倾、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当时的“速胜论”“城市暴动论”颇有市场,因为那是苏联成功的经验。当时的“悲观论”也甚嚣尘上,“红旗能打多久”的疑问,曾引发了一部分人共鸣。人类演进史表明,遵循前人的经验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正因为如此,往往在遇到困难时,就有那么些人习惯于寻找乃至固守前人的经验,不管是古人的还是洋人的。而革命家的伟大就在于能够突破创新的“盲区”,或者说,能够突破人们的习惯思维,在探索中提出真知灼见。而这些识见,有时候可能和既有经验有所不同,甚至相反。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不等于会用马克思主义,也不等于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里有个“知行合一”的哲学问题。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讲“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卷上》),强调“知”与“行”不可分。王阳明认为“良知”并不是“闻见之知”,而是“德性之知”。所谓“德性之知”即是性体之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知爱知敬、知是知非,当恻隐自然恻隐,当羞愧自然羞愧。这种“知”发自内心的本心,并不是依靠见闻就能获得的。这里讲的“德性之知”就是认识论上的“所以然”。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讲的也不是见闻之知,而是德性之知,是“所以然”。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中探索的就是这个“所以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德性之知”,是对规律的把握。毛泽东同志为这个“德性之知”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一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横扫怀疑者的心理阴霾,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模式。

尽管当时的毛泽东曾被定性为“右倾逃跑主义”,被撤销了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但真金不怕火炼,毛泽东同志所确定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遵循。

第二阶段,土地革命及战略转移,解决了党的核心领导问题

事实证明,党的核心领导是伟大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这是一个大“理”。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中国革命在反动派疯狂反扑中跌入低潮,苏区大幅收缩,队伍迅速减少,仅 1927 年 3 月至 1928 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达 31 万多人^①。这个时期的革命,实际上步入进退维谷之中,在逆境面前,部分人脱离了党,部分人走到了党的对立面,更有一些人牺牲在错误路线上。比如,参加党的一大的代表中,就有陈公博 1922 年脱党,李达 1923 年脱党,李汉俊、周佛海 1924 年脱党,包惠僧 1927 年脱党,刘仁静 1930 年被开除出党,张国焘 1938 年被开除出党。13 人中有 7 人离开或被开除,另有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和陈潭秋 4 名同志为革命牺牲。这一数字既显示了革命洪流的大浪淘沙,也书写着为有牺牲多壮志的革命豪迈。从起点走到胜利的只有 2 人:毛泽东、董必武。这真是炼狱地火般的考验!血的教训让中国共产党人醒悟,要取得中国革命胜利,必须坚持武装斗

^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 年,第 33 页。

争,组建由党直接统率的军队;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发动农民参加革命;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加强民主集中制。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明确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得以确定,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集体领导,从而在关键时刻解决了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问题,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有了领导核心,中国革命就有了信仰信念。“北上抗日”既是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也是面对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意图吞并中国形势下红军新的斗争任务。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洪流中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上,也在党内军内起到了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的作用。当然,北上也有靠近苏联,便于得到外援的打算。

1935年9月,红军打下榜罗镇后,直属侦察连连长梁兴初从哈达铺找到一份《大公报》,上面有阎锡山的讲话:“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报纸还披露: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控制了大块陕甘苏区,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已经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①正是根据这份报纸传递的信息,毛泽东调整了红军北上的路线,这才有了后来的革命圣地延安。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领导核心的确定也就解决了党内军内信仰信念问题。信仰共产主义,相信毛泽东,成为有觉悟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和坚守。而张国焘错误地判断形势,逆中央意志而南下,甚至另立中央,结果导致红四方面军蒙受巨大损失。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②越是在逆境之中,人的信仰信念越是能得到考验和锤炼。

什么是信仰?一般来说,信仰是人们对某种主义、主张、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用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和指南。它主要有三个要素:信仰主体、信仰客体和信仰方式。从信仰主体方面分析,一个人有没有信仰,要看其有无信仰心态和信仰行为,而信仰行为既有仪式性的,也有非仪式性的,前者如宗教,后者如道德,即“自觉”问题。从信仰客体看,包括观念形态和物象形态,我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既是观念形态又是物象形态,而更多的是观念形态。从信仰方式看,包括理论确认、情感体验和行为追求,三者有不同的特征和表现,而不同的信仰方式将导致不同的信仰色彩和信仰结果。

马克思在17岁时就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③这是何等坚定而崇高的信仰!哲学家尼采也说过,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他就可以忍受生活加诸他的一切苦难。习近平总书记在《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中引用古人“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讲的就是信仰的力量。

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面临各方面困难,拟向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借款”。当时的红二十五军从序列上属于红四方面军,即张国焘的部队,是否服从中央的指挥还是个问题,因为当时张国焘正在“另立中央”呢。毛泽东试探性地给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写了一封信,提出借1000元大洋。徐海东没有任何犹豫,从部队不足6000元的存量中直接给中央送去5000元,并复信表示:完全服从中央领导。这就是一个战士的忠诚,是信念信仰的坚定。这样的人,不为官、不为钱、不怕苦、不怕死,只为主义,

^① 参见金一南:《党旗为什么这样红》,《党建》2017年第11期。

^② 《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9页。

只为信仰使用一生去奋斗。毛泽东称其为对革命有大功的人。^①

第三阶段,顺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解决了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当地中国军队奋起反抗,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国家存亡关键之时,我们党及时提出:“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②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转发了中共中央抗战宣言,蒋介石被形势所迫也发表了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国共重新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是该阶段的主要标志。正所谓旧问题解决了,新矛盾又产生了。1937年11月底,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回到延安,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并对党内许多正确的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这些做法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坚决抵制。1938年7月,共产国际领导人也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③1938年9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明确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④。这里又是问题导向。六届六中全会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⑤这次全会正确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明确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战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思想,推动了各项工作迅速开展。

1938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科学回答了中国抗日战争面临的系列问题,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⑥、“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⑦等精辟论述,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总方针,是我党领导抗日战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基本遵循。面对国民党各种形式的破坏捣乱,我们党明确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⑧口号,对国民党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尤其是在“皖南事变”后,我们党公布真相,揭露国民党阴谋,迫使蒋介石公开“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学习新型战争,既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又组织了百团大战,到1940年底,党领导的武装部队达到50万人,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创建了16块根据地。同时,我们在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和政权建设,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三三制”^⑨、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颇得人心。到1943年,敌后根据地机关能够自给半年的粮食和蔬菜,人民的负担只占总收入的14%,按当时水平,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而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愈加深厚,当时中共冀南区三分区机关报取名《人山报》,意为“人民是靠山”,由此可见我们党对人民的感情至深至厚,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概括为“人民就是江山”^⑩。

① 参见王江涛等:《徐海东三次“让官”记》,《党史博采》2000年第6期。

② 《中国共产党简史》,第74页。

③ 参见《中国共产党简史》,第8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25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7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1页。

⑧ 《中国共产党简史》,第84页。

⑨ 《中国共产党简史》,第95页。

⑩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面对逆境,需要有“逆商”。“情商”“智商”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么“逆商”是什么呢?逆商是指克服逆境的意志和力量。考察一个人的“逆商”,主要看其是否能够在逆境中拥有掌控力、担当力、影响力、可持续性发展等要素,这决定了其在艰苦卓绝的境地中是否能坚持,或者说能坚持多久。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堪称典范。

1945年5月31日,在党的七大的结论报告中,毛泽东同志一口气列出了17条困难,告诫全党要“准备吃亏”:一是外国大骂;二是国内大骂;三是被国民党占去几大块根据地;四是被国民党消灭若干万军队;五是伪军欢迎蒋介石;六是爆发内战;七是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了希腊;八是“不承认波兰”,也就是共产党的地位得不到承认;九是跑掉若干万党员;十是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十一是天灾流行,赤地遍野;十二是经济困难;十三是敌人兵力集中华北;十四是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负责同志;十五是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十六是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十七是其他意想不到的事。^①这17条困难,涉及国际国内、党内党外、政治经济、军事外事、天灾人祸等方方面面,可谓把一切有可能发生、甚至不太可能发生的困难都想到了。这些困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有的是果然遭遇了,有的是部分地出现了。为什么在革命形势大好的前提下讲这么多困难?毛泽东同志阐述道:“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计到。”^②“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总之,要有这种精神准备,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③

这就是高“逆商”的表现,体现出领袖的坚定信念和非凡气度。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未雨绸缪,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准备,有备无患、把握主动,这是毛泽东同志从党一路走来所经历的血雨腥风、艰险磨难中得出的深刻认识和重要领导方法,也是我们党以问题为导向的生动实践。大革命失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等一系列惨痛教训,深刻教育了党,使党逐渐认识到,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头脑都要格外清醒,充分预见困难,主动谋划未来,才能确保正确的革命方向。

准备吃亏、预想困难,丝毫不意味着对前途悲观失望,因为我们具备困难面前的掌控力、担当力、影响力和可持续奋斗条件。针对17条困难,毛泽东同志又讲了“我们一定要胜利”的8条理由:一是暂时吃亏,最终胜利;二是此处失败,彼处胜利;三是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四是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五是经济困难就学会做经济工作;六是克服天灾;七是党内发生纠纷,也给我们上课,使我们获得锻炼;八是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④这8种克服困难的方法,充满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道理浅显,力量巨大,统一了意志,激发了斗志。正是把“困难”和“不光明”都估计到了,党的七大才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方针、纲领和政策,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毛泽东为此自信而豪迈地指出:“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⑤

第四阶段,夺取新民主主义全国胜利,解决了党在新中国的执政合法性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后,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成为中国历史主流。国民党以抗战胜利者的姿态进驻各大城市,却施行了一系列倒行逆施政策,激怒了广大人民群众,国统区大学生越来越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上^⑥。鉴于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同志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① 参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92-197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02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88页。

^④ 参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98-199页。

^⑤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第508页。

^⑥ 参见《中国共产党简史》,第127页。

充分表达了我党诚意,被柳亚子称为“弥天大勇”^①,社会好评如潮。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但是,蒋介石从来都未想过去履行协议,这时国民党军队兵力430万人,其中正规军200万人,而解放区人民军队只有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双方兵力对比是3.4:1。国民党拥有装备较好的陆、海、空军,解放区人民军队仅有少量火炮。国民党统治区有3.39亿人口,占领着全国版图的76%;解放区人口只有1.36亿,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24%。国民党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认为可以速战速决,甚至扬言“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中共军队^②。面对强敌,我党在战术上不去争一池一地,而是放弃了一些大城市,与敌人进行周旋游击,既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又击败了他们的重点进攻,最后通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彻底扭转了敌强我弱形势,赢得了整个战争的胜利。

整个解放战争过程,就是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回馈群众的过程。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到1947年下半年,解放区三分之二的地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又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广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进而更加自觉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淮海战役时我军60多万人对敌战斗,却有200万民工保障后勤,充分显示了解放战争的正义性和人民性。陈毅元帅曾感慨道:“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于1949年3月由西柏坡来到了北京(北平)。被毛泽东称为进京“赶考”的举动,标志着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转向了城市。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面对两条道路、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中国政坛原先的中间力量出现分化,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局面形成。新中国的成立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领导,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认同与选择,成为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法理力量。

第五阶段,赢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解决了中国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问题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立即作出武装干预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统一大业。10月初,美军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直接威胁新中国安全。危急关头,朝鲜劳动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支援。

敢不敢、能不能迎战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对于成立仅一年而且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以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与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展开了保家卫国战斗。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对手于1953年7月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③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在站立起来之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正所谓“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帝国主义从此再也不敢作出武力征服中国的尝试,新中国由此站稳脚跟,进而赢得了几十年的国际和平环境,这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重要标志。

① 《中国共产党简史》,第113页。

② 《中国共产党简史》,第117页。

③ 《中国共产党简史》,第154页。

第六阶段，勇于纠正自身不足与错误，解决了在曲折中自身发展问题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同志满怀信心地指出：“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①。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开始了。这期间我国诞生了“两弹一星”，工业得到跨越式发展，产业布局不断完善，“三线建设”开辟了战略大后方，也利于解决东西发展差距问题；而划分“三个世界”，调整与美国、苏联的关系，为我国后来的发展营造了良好国际环境。

但这一时期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出现了错误，阶级斗争仍然被当作社会主要矛盾，并依此进行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是反右扩大化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一定程度上拉低了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

这是党在历史上遇到的空前的逆境，带来的是空前灾难。一般来说，应对逆境时有四个岔道是必须注意的，也是避免二次灾难的要点：一是原地踏步，不再奋斗，保持既得利益；二是依赖外力，多数是等待施援，比如今天的污染问题等待明天的科技进步；三是“打鸡血”，即失去理智，自我加压、自我励志，出现“后群体综合征”；四是心灰意冷，毫无斗志，甚至倾向倒退。我们党的伟大，就在于勇于自我革命，积极纠正错误，努力避免了走向上述四种岔道。“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及时发动了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将中国人民的思想从“两个凡是”中解放出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进而提出了改革开放，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幕终于拉开，邓小平理论也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我们党及时进行拨乱反正，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启动农村改革，创办经济特区，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进行改革，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新格局，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步入快车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幅9.2%，中国经济总量一跃上升为世界第二，创造了又一个世界奇迹。事实证明，经过自我疗愈，我们党更加健康，更加成熟。

第七阶段，改革开放再创辉煌，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1992年，在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997年9月，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提法，并将这一理论作为指引党继续前进的旗帜；大会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特征和要求，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三步走”方针。随后农村全面改革和国有企业改组改造得到积极推进，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颁布，实施了国企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同时解决国企职工下岗问题。再后来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相继提出，实现了1997年香港回归和1999年澳门回归，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随后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7年10月，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创造性地提出并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理论——中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由此我国开始应对重大挑战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有力推进“一国两制”实践。提出中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①,表达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走回头路,不背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偏离四项基本原则,不搞“和平演变”的坚定立场。沿海战略、西部开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一系列有力举措让一切发展要素竞相迸发,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我们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这些考验不仅是拦路虎,也是磨刀石,是逆境飞扬的新台阶。党的十八大提出“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②,可以说是振聋发聩,令人警醒。迎接考验,解决危险,成为我们党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动力。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任务,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确立;从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部署,到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和确立科学发展观,都是落脚于我们党举旗定向问题,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问题。

第八阶段,步入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大会贯穿始终的主线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并阐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和在全党的核心地位,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总书记的党中央核心、全党核心地位写入党章。确立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是实践的选择、历史的选择,也是党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标志着我们党再次解决了自己的信仰、信念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上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③,并在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的长江经济带建设,以促进合作共赢为落脚点的“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促进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强化激励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等战略,都对我国经济发展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民主政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早在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系统部署,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定位为“战略布局”^④。随之,“四个全面”齐头并进,大放异彩。

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大会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① 《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第12页。

② 《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第50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44页。

④ 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23页。

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大会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大会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大会报告用“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全面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2018年2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随之,用了一年时间,将机构改革落实到位。2020年底如期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尤其是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成就,所有贫困县如期“摘帽”、贫困村“出列”,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①,制约中国人吃饭、穿衣的千年难题得到根本性解决,极大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小康社会建设各类指标如期完成;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迈出坚实步伐,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卓著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②2018年7月中央提出做好“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果断处理香港“修例风波”,进而提出“爱国者治港”政治规矩。尤其是面对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果断决策,率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打响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落实“六保”,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将损失降到了最低点,赢得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重大战略成果,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当年GDP正增长的经济体。

在巨大成就面前,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提醒大家要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2018年1月在中央党校为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举办的学习班上,总书记引用了明代《铁公良测语》的一句话:“天下之祸不生于逆,生于顺”,强调“消祸于未乱”“消未起之患”。总书记强调要做到三个“一以贯之”,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③;提醒全党“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④;强调“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性风险,这是我一直强调底线思维的根本含义”^⑤。2019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培训班上,习近平总书记从8个方面列举了16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风险,包括政治安全方面、经济安全方面、战略安全方面、主权安全方面、周边安全方面、反分裂方面、社会稳定方面、自然灾害方面等,要求大家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准备,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⑥在2019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风险考验。要实现我们党确定的目标任务,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列专章作出战略部署,更加突出了底线思维和问题导向。

正是有了鲜明的指导思想,我们才能在工作中把握主动,才能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稳定我们的预期。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既见证了中国举国体制下抗击疫情的优势,也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未雨绸缪的英明判断,这既是我们工作的动力,也是我们奋斗的信念。

① 参见《〈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2021年。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77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69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73页。

⑤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第334页。

⑥ 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220页。

我们学习党史,是为了“明理、增信、崇德、力行”。这里的“理”,是国之大者之理,“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这个“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人民的立场,就是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了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思维更加清晰,工作更加给力。从“问题导向”方面来论述这个“理”,可以看出,这个“理”来之不易。回到认识论上,我们还是要强调“知与行不可分”。古人讲,心知善恶时,便已好此善、恶此恶了,这时,“知是行之始”,是条件论;但当我们知善恶,并把其具体到实践中去,就是“行是知之成”,是结果论。知得真切,知得笃实,便是行;行得明觉,行得精察,便是知。这个“明觉”“精察”,助力我们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判断力、领悟力、执行力”。知的过程与行的过程是相始相终、相辅相成的,我们学习党史,应该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The “Problem-oriented” Centenary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Zhang Ji

(Policy Research Office,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ijing 100017, P.R.China)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was born in distress, grew in distress, and became stronger in distress.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the CPC has been in adversity and has continuously won victories in solving problems, among which an important experience is being “problem-oriented”. To sort out the centenary history of the CPC, it can be divided into eight stages, namely, flag orientation, core leadership, independence, legitimacy of governance, self-reliance among world powers, self-development, construct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nitiating a new journey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Each stage can be regarded as a model of “problem-oriented”.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 centenary history; Problem orientation; Going out of adversity

[责任编辑:赵玉华]